

典籍翻译中直译法策略的选择

——以《圣经》翻译和佛经翻译为例

◎卢 颖

(湖北省襄樊学院外语系 湖北·襄樊 441053)

摘 要 《圣经》翻译和我国的佛经翻译是两个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在翻译方法上,都采用了直译法策略,本文从宗教、文化和文本三个角度,剖析《圣经》翻译和佛经翻译采用直译法的原因。

关键词 《圣经》翻译 佛经翻译 直译法

西方翻译史的《圣经》翻译和我国的佛经翻译是两个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在翻译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圣经》翻译是基督教的经典,而佛经又是佛教的教义经典,由于宗教的传播,这两种经典都经历了大规模的翻译洗礼。在这两种翻译活动中,文化及宗教原因,原语文本的缺乏制约着译者的翻译策略。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剖析它是如何支配译者采取直译法策略的。

一、宗教笃信

佛教和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两大宗教,对人类的精神世界都产成了很大影响。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早在公元前65年以前便已传入中国。由于佛教的某些教义如要人厌世,忍辱修行等非常有利于当时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进行精神奴役,佛经便在统治阶级开始传播,并且地位逐渐巩固。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便是尾声了。^①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主要是讨论佛经翻译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文”“质”之争成为了贯穿中国佛经翻译全过程的中心议题。所谓“文”,即文辞、文丽,而“质”则是质朴。佛经的“文”“质”之争便是围绕着佛经翻译是该以传达其内容——佛经为主,还是应以译文的文辞华美为主展开的争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则成为了“文”“质”之争的内在辩题。主张“质”派即偏于直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释道安等人,认为译文应充分传达原意,对原文不得增减,有时词序上也要求照搬原文,否则便是“掺了水的葡萄酒”。道安认为翻译的目的是让人们通晓用异域之语所撰经文传达的意思,如果改变了原文的面目,译文也便失去了价值。可见对经典佛经的尊崇。而且,严琼的八备中第一条第一句便有“诚心爱法”,即诚心热爱佛法,要求译者最首先应该诚心的对待佛法,可以看出当时的译者对佛教的笃信和忠诚。最重要的是译者基本上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对

佛经更是亦步亦趋,不敢偏离原文半步。所以,直译法成为当时比较盛行的翻译方法,宗教对译者的束缚是造成佛经翻译直译法策略的一大原因。

类似的是,《圣经》的翻译也有着同样的趋势。《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它包括希伯来文的《旧约》和希腊文的《新约》,《旧约》本是犹太教的经典,而《新约》成书于一至二世纪下半叶。对于基督教的传播,《圣经》的翻译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宗教势力在西方历来强大,对《圣经》翻译极为重视。^②令人惊奇的是,在翻译《七十子希腊文本》过程中,“译者象着了魔一样,在上帝的感召下,几个人译出的结果不是互有差别,而是一词一句都相同,好比听写一样。”^③也就是说,同希腊语翻译《圣经》的七十二个译者尽管是分散工作,尽管语言词汇的丰富可以使一个思想有多种表达,但由于译者们得到上帝的感召,所以最后的结果却彼此相同。不仅如此,当时翻译界有人认为《圣经》翻译是神圣的,译者单凭精通两种语言而无上帝的感召便不能从事翻译,而且,如果只通语言,不通上帝,根本就不可以从事两经的翻译。所以当时的译者坚持“受上帝的感召”,采用直译死译的做法,因为当时死抠字眼,译文质量低劣,可见宗教笃信对译者策略的选择的影响有多深。

其实,不论是《圣经》还是《佛经》,除了本身所宣扬的宗教意义,还有着很重要的文学意义。由于当时的译者笃信宗教,认为经文便是上帝或是佛的话语,所以不敢自由的意译,而是亦步亦趋,严格按照经文的语法结构进行字对字的直译。尽管译文读起来晦涩难懂,听起来象天书,但是他们还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戴的宗教的镣铐跳舞。原著的文学意义,文学色彩被他们忽略,导致翻译使原文的价值大大的丧失。

二、文本缺乏

佛经是由古印度的梵语所写成。在佛经翻译初期,翻译往往是中外合作的,一般先由外国僧人背诵(初期译经没有原本),再由懂西域语言(不完全是梵语,有的是西域诸国语言,即

所谓胡语)的中国居士或僧人翻译成汉语,再执笔写下来。⁴在鸠摩罗什之前,译经原本大部分是西域诸国的文本,即“胡本”。译经僧人也是不敢自由翻译佛经,而是按照胡本这一第二原本来翻译。直译则成为重要的翻译方法。直到鸠摩罗什把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才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过来,严琮说“梵语虽讹,比胡有别”,就是说梵本虽然有错误之处,总比西域诸国所传的当地语言译本要可靠的多。由于佛经文本的缺乏,又因为最初的佛经翻译用的是胡语文本,所以,当时的译者更加不敢对译文有擅自改动的地方,而是采用了直译,生怕意译亵渎了佛的语言,尽量保留佛经原来的面目。

《圣经》之《旧约》是基督教从犹太教承袭下来的,原文为希伯来语。犹太人由于长期分散四方,漂流海外,久而久之,便忘记了祖先的语言,操起阿拉姆语和希腊语等外族语言,其中以说希腊语的占大多数。公元前三世纪,为了满足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的需要,教会决定将《旧约》的希伯来文本译成希腊文本。成果即为《七十子希腊文本》。该译本出后不久,神父们和犹太首领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指出“这个一本译得好而虔诚,又十分准确,因此,必须保持其原状,不得更改。”教徒们也奉其为经典译本。⁵这个希腊语译本成了第二原本。以后的许多《圣经》译本不以希伯来原文而以希腊语译本为蓝本,所以,《七十子希腊文本》一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的各种译本。由于《七十子希腊文本》当时翻译时采取的主要是直译的原则,在后来的各种语言的译本中,都以此为标准,不敢妄自改动。没有了先前的希伯来原本,看不到原本的真面目,是制约后来各种《圣经》的一大原因。由于翻译的原本是第二原本,译者不容易透过第二原本来领会原本的真正意义,所以译者不敢轻易采取其它的翻译原则,只得严格的按照《七十子希腊文本》来间接地用直译法则来翻译。译者的自主权完全被剥夺。

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的第二原本成为了制约译者发挥的重要因素,由于第一原本的缺乏,译者们不得不采用直译法策略,按照第二原本来进行翻译,由于第一原本的翻译错误和同样采用的直译法进行翻译,译文更加的晦涩难懂。

三、文化因素

在一定的文化语境和文化空间中,译者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立场,而这种文化立场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⁶一个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面对不同的作品,具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立场。而态度与立场不同,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必然有别。⁷庞德和菲茨杰拉德对中国诗歌的翻译虽然及受读者的赞赏,但是他们对中国诗歌的极大改造和随意处置显示了他

们对中国文化的不恭。对于他们来说,英美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强势文化,他们的文化心理是轻视所译文化的。由此他们的译诗基本上是改写,不能称为是翻译。反过来说,如果译入语文化是相对的强势文化,那么译者翻译的文化态度一定是拘谨的直译原则,因为在他们心中认为译入语文化有着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不敢对译入语有任何擅自的改动。

由于佛经是从印度传入中国,所以中国的佛教徒对印度有着极高的崇敬。而当时的译者一部分是天竺人,一部分是懂梵语的虔诚的中国佛教徒,这两部分译者都对译入语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并且深受其熏染,所以基于这种翻译文化心理,在译经时,基本上采用的贴近译入语语法的直译法,有些词汇甚至都是音译过来的,显示了对印度文化的无比尊崇。

纪元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是“公元前285年至249年间,有七十二名‘高贵的’犹太学者云集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从事这项翻译。据传,这七十二名学者来自十二个不同的以色列部落,每个部落六名。”⁸虽然《七十子希腊文本》是由犹太人翻译的,但是“尽管希腊语已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但他们毕竟不是在希腊,周围非希腊语的语言环境以及祖先的语言无疑给他们很大的影响,⁹”,可见在这七十二名译者心中,古老的犹太文化还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而,他们的译文“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由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象希腊语。”¹⁰

文化对于译者策略选择的作用是巨大的,它象翻译幕后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译者的翻译态度和翻译心理,从而最终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

四、结语

记载犹太民族一千多年的文化史的《圣经》和影响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佛经,在基督教和佛教的传播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对两种宗教的教义经典的翻译,也成为统治阶级一项重要的任务。值得深思的是在《圣经》和佛经翻译的初期都采用了直译法的原则。在剖析了其中的宗教、文本和文化因素之后,笔者深感影响译者采取直译法的原因还很多,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 ①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P18-P19.
- ②③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27,P28.
- ④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P46.
- ⑤杨瑞萍.西方翻译史上的《圣经》翻译.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6).
- ⑥⑦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208.
- ⑧⑨⑩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16-17,P17.